

從「新名詞」到「關鍵詞」專題引言

潘光哲*

一、

1904年1月13日，大清帝國的湖廣總督張之洞（1837-1909）與管學大臣榮慶（1859-1917）、張百熙（1847-1907）聯名向清廷呈交關於制定新學制的《奏定學堂章程》，得到批准，「癸卯學制」就此成立，¹影響深遠。其中提出的〈學務綱要〉，張之洞等人意有所指地強調：「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，以存國文，端士風」。²回到歷史的場景，張之洞等人不准「襲用」的那些「外國無謂名詞」，以當時的普遍說法，即是所謂「新名詞」，其流傳廣泛之程度，往往令人幾無自覺。就以〈學務綱要〉而言，固然有此等「命令」，自身卻是逃避不了那些「外國無謂名詞」的「天羅地網」，它大量引用日本憲法以解釋「民權」、「義務」等等詞語的意義，即知其一二；³另一個例子，則發生

* 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。

¹ 相關述說，參見李細珠：《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116-125。

² 張百熙、榮慶、張之洞：〈學務綱要〔光緒廿九年十一月廿六日（1904年1月13日）〕〉，收於陳學恂主編：《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》（北京：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上冊，頁532-551，引文段落，參見頁537-538。

³ 沈國威：〈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對「新名詞」之反應〉，《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》第2號（2007年3月），頁112。

在張之洞本人身上。據說，當張之洞督管學部之後，⁴ 閱看公文，眼見稿中有「新名詞」，便即批曰：「新名詞，不可用」。部員某，年少好事，夾了張條子，文曰：「新名詞亦新名詞，不可用」。公文送上，卻沒將條子拿出來，張之洞「見而慚怒，竟日不語，遍翻古書，欲有以折之，卒不可得，乃霽顏謝焉」。⁵

張之洞的這等「雅量」，算是難得。畢竟，在西力東漸的時代脈絡裡，正如王國維（1877-1927）在1905年的觀察，處於「西洋之學術駸駸而入中國」的時分，「則言語之不足用，固自然之勢也」，因此，「講一學，治一藝，則非增新語不可」，⁶ 因應時代變遷和現實需要，意欲表達新事物，闡述新思想，引介新觀念，「新名詞」當然如湧泉而來，其勢頭之澎湃，根本抵遏不了；抑且，「新名詞」影響無遠弗屆，即使同張之洞一樣對「新名詞」沒有好感的人，也不得不感慨言之：「學者非用新詞，幾不能開口動筆」，⁷ 沒有了「新名詞」做為「概念工具」，漢語的使用者，居然也就失去了發聲創言的能力，難可理解詮釋自身的經驗世界了，⁸ 即使痛斥「新名詞」的人，到頭來還是逃離不了「新名詞」的「魔障」，理所當然。市面上還出現了諸如《新

⁴ 張之洞於1906年9月4日授軍機大臣，22日為兼管學部大臣，參見馬東玉：《張之洞大傳》（瀋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頁421。

⁵ 瞿兌之：《樵廬所聞錄》，甲集，頁27-28；本文引用的版本是瞿兌之：《樵廬所聞錄·故都聞見錄》，《民國筆記小說大觀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第1輯。

⁶ 王國維：〈論新學語之輸入〉，《靜庵文集》，頁97A-100B；本文引用的版本是趙裴雲編：《王國維遺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第5冊；按，本文撰於1905年6月，參見袁英光、劉寅生：《王國維年譜長編（1877-1927）》（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34。

⁷ 柴小梵（柴萼）：《梵天廬叢錄》，卷27，頁1033；本文引用的版本是柴小梵：《梵天廬叢錄》，《民國筆記小說大觀》（太原：山西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第4輯。

⁸ 王汎森：〈「思想資源」與「概念工具」——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〉，《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2003年），頁188-189。

爾雅》⁹ 這等專門介紹「新名詞」的專書，¹⁰ 以便按圖索驥。

凡此諸端，略可想見，約略在十九、二十世紀之交，各式各樣的「新名詞」，已然在人們的知識結構和日常用語裡，佔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，影響深遠。因是，各色「新名詞」的意義所在，自是漸受注意。前此如實藤惠秀（1896-1985）、沢田瑞穂（1912-2002）等先行者早即注意相關場景，各有勾勒；¹¹ 任教於日本關西大學的沈國威的研究視野，亦漸轉移於此；¹² 特別是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的黃興濤，觀察總結「新名詞」的義蘊所在，實可視為「現代性」導入中國的具體徵象，這些「新名詞」或者直接反映了現代性物質文明的成果（如「蒸氣船」、「火車」等等），或是直接反映了現代性的制度及其實踐（如「議員」、「銀行」等等），或者凝聚了作為現代性之核心的某些價值觀念（如「科學」、「自由」、「人權」等等），亦或是現代學科知識和成果的學術術語（如「代數」、「化學」、「物理學」等等），¹³ 在在發

⁹ 汪榮寶、葉瀾編纂：《新爾雅》，上海明權社發行，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）六月印刷本，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7年），第44輯；是書目前最方便利用的版本是沈國威編著：《〈新爾雅〉とその語彙：研究・索引・影印本付》（東京：白帝社，1995年）。

¹⁰ 後來還有如追索「新名詞」在古代典籍之淵源的專書，參見周商夫編：《新名詞訓纂》，收於波多野太郎編：《中國語文資料彙刊》（東京：不二出版，1995年〔據1918年上海掃葉山房刊石印本影印〕），第5篇，第3卷；又，是書內文署「杭縣周起予商夫編」。

¹¹ 實藤惠秀著，譚汝謙、林啓彥譯：《中國人留學日本史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頁205-216；沢田瑞穂：〈清末の「新名詞」論議〉，《宋明清小説叢考》（東京：研文出版，1996年），頁336-344。

¹² 除了前引沈國威〈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對「新名詞」之反應〉一文之外，另可參見沈國威：〈新名詞與辛亥革命時期之中國——以來自日本的影響為中心〉，《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》，別冊8（2012年2月），頁195-206。

¹³ 黃興濤著，川尻文彥譯：〈清末民初、新名詞・新概念の「現代性」問題——「思想現代性」と現代性をおびた「社会」概念の中国での受容〉，《現代中國研究》第17號（2005年9月），頁83-84（參見黃興濤：〈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的「現代性」問題——兼論「思想現代性」與現代性「社會」概念的中國認同〉，《天津社會科學》2005年第4期，頁130）；黃興濤其他關於「新名詞」的探索，如黃興濤：〈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微——兼談對於「一般思想史」之認識〉，《開放時代》2003年第4

人深省。其他相關研究，紛紛問世，美不勝收。¹⁴

只是，在同一座思想／言論舞臺上面世的這些「新名詞」，如屬「同指異名」，彼此之間，其實爭競無已，甚且與政治立場的展示／鬥爭，息息相關。¹⁵ 因此，即令研究「新名詞」的成果已若花開滿園，相關的具體課題，猶可持續以爲。即如那些本來也是眾所同曉廣用的「新名詞」，如何歷經光陰的汰洗，最終景爾被遺忘不存，頓成歷史的灰燼，其間前後之歷程曲折，如可詳爲細考詳述，不僅可以具體展示語言文字的變異，也充分彰顯思想觀念的轉換。像是在晚清中國政體類型知識「概念工程」裡一度廣泛流行的「君民共主」一詞，今日知之者罕，當年卻是可以促使士人進行「政體抉擇」的「思想資源」，驅動著政治思維的變易，¹⁶ 實是考察西方「民主」思想如何輸入中國不可或缺的一頁。類似例證，想必繁多難盡。是以，開展相關的研究事業，不能只注意那些曾經獨領風騷的「新名詞」，已然「淡出」歷史舞臺的「新名詞」，也具有納入我們考察視野的價值。「新名詞」的研究工程，如何百尺竿頭，再躍一層，顯待學界同好切磋共進。

期，頁70-82；不詳引注；黃興濤對「她」字的考索，尤值注意，參見黃興濤：《「她」字的文化史：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》（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09年）。

¹⁴ 參見 Michael Lackner, *New Terms for New Ideas: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*, ed., Iw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 (Leiden & Boston: Brill, 2001)；章清：〈「界」的虛與實：略論漢語新詞與晚清社會的演進〉，《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》，別冊7（2011年3月），頁55-76；餘例不詳舉。

¹⁵ 黃克武：〈新名詞之戰：清末嚴復譯語與和製漢語的競賽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62期（2008年12月），頁1-42。

¹⁶ 關於中國晚清時期政體類型知識「概念工程」的述說，參見潘光哲：〈晚清中國士人與西方政體類型知識「概念工程」的創造與轉化——以蔣敦復與王韜爲中心〉，《新史學》第22卷第3期（2011年9月），頁113-159；潘光哲：〈美國傳教士與西方政體類型知識「概念工程」在晚清中國的發展（1861-1896）〉，《東亞觀念史集刊》第1期（2011年12月），頁179-229。

二、

「新名詞」之問世定著，本即錯綜複雜，相涉之課題，更待博雅君子慧識琢磨。例如，歷時既久，原來所謂「新名詞」者，竟可轉化為在公眾生活世界裡不可或缺的「關鍵詞」(keywords)，¹⁷ 其間來龍去脈，變化傳承之場景，如詳為精研深究，可以展現的歷史圖像，想必更是豐富多彩；可以拓展的歷史認知空間，同樣必然廣闊無邊。某些儼然位居「關鍵詞」地位的「新名詞」，指稱對象具體可辨，當是眾無異辭。即若當今稱呼英國「國會」(Parliament)的「巴力門」一詞，在漢語世界之濫觴，首見於以英國倫敦傳道會牧師慕維廉(William Muirhead, 1822-1900)作為主要翻譯者而完成的《大英國志》(1856年首度出版)，其生命力，至今始終不輟。¹⁸ 然如為表達抽

¹⁷ 關於「關鍵詞」研究，自然必須言及英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雷蒙·威廉士(Raymond Williams, 1921-1988)的業績：Raymond Williams, *Keywords: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* (London: Fontana, 1983, revised edition)；漢譯參見威廉士著，劉建基譯：《關鍵詞：文化與社會的詞彙》(臺北：巨流圖書公司，2003年)；在威廉士看來，「關鍵詞」一方面，在某些情景及詮釋裡，它們是重要且相關的詞。另一方面，在某些思想領域，它們是意味深長且具指示性的詞；抑且，威廉士強調，即使應用「歷史語義學」(historical semantics)的方法，研究「關鍵詞」的時候，「不僅強調詞義的歷史源頭及演變，而且強調歷史的『現在』風貌——現在的意義、暗示與關係」，但是，他更有意挑選與諸般「變異、斷裂與衝突之現象」相關者，以展示「詞義的延續、斷裂及價值、信仰方面的激烈衝突等過程」。參見威廉士著，劉建基譯：〈導言〉，《關鍵詞：文化與社會的詞彙》，頁XXVI、XXXIV-XXXV；當然，威廉士的「關鍵詞」研究，他本人對相關理論之申論甚眾，並自有其形成史(涵括其個人政治社會關懷等多重意義)，即便廣受矚目接受，同時批判亦眾，略可參見Alan Durant, "Raymond Williams's Keywords: Investigating Meanings 'Offered, Felt for, Tested, Confirmed, Asserted, Qualified, Changed'," *Critical Quarterly*, 48: 4 (Winter 2006): 1-26；相關細節，本文不可詳論。

¹⁸ 潘光哲：〈晚清士人對英國政治制度的認識(1830-1856)〉，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》第17期(2000年5月)，注4，頁150；馬西尼(F. Masini)則謂「巴力門」一詞首見於1874年出版的《教會新報》，參見馬西尼著，黃河清譯：《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——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》(上海：漢語大辭典出版社，1997年)，頁189。

象概念的「關鍵詞」，意涵所在，即便各說各話，自有其解，彼此竟能心領神會，共知同曉，足可信手捻來，倡言立論，亦是義蘊豐贍。即如「現代化」(modernization)一詞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形成流傳以來，知識人既可以據之表達他們對中國未來前景所向的各種想像，也具有書寫近代中國歷史變遷的「敘述實體」的作用，正若足可供各方論者自由開展述說的無限想像空間，意態萬千。¹⁹甚且，若干「關鍵詞」其實「古已有之」，惟其古今傳承之變化，意趣所載之轉異，脈絡多樣，未必「涇渭分明」，本非一語足可蔽之。正若在現代民主政治體系裡絕對居於「關鍵詞」地位的“party”，於當下漢語世界裡如何不證自明地等同於「黨」，本是在具體的歷史情境裡被建立起來的，展現之樣態，多重繁雜。²⁰又如「革命」一詞，古代漢語世界淵源已久，以「跨語際實踐」角度考究「革命」、來自日本的「かくめい」和英文的“revolution”三詞之間的翻譯和傳播過程，具體顯示「革命話語」的建構，實具相當的偶然性、隨機性和可塑性，猶如開放的闡釋空間。²¹「黨」與「革命」的古義今解之間，糾纏繞結，歷經漫長的歷史過程與現實需求的相互糾纏，其作為「關鍵詞」的意涵，或許方可終告塵埃落定。但是，如欲以看似脈絡分明系統整齊的宏觀論說而可截斷眾流，包攬乾坤，必致屢屢遺漏前行者的思想努力及其軌跡而難免「偏見」之疏，²²竟讓此刻進行問學致知的努力，其實只是製

¹⁹ 潘光哲：〈想像「現代化」：一九三〇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個解剖〉，《新史學》第16卷第1期（2005年3月），頁85-124。

²⁰ 潘光哲：〈晚清中國「政黨」的知識系譜：思想脈絡的考察（1856-1895）〉，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第48期（2008年），頁241-279。

²¹ 陳建華著，張暉譯：〈世界革命語境中的中國「革命」〉，《東亞觀念史集刊》第1期（2011年12月），頁231-260；參見陳建華：《「革命」的現代性——中國革命話語考論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
²² 即如金觀濤與劉青峰賢伉儷藉「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（1830-1930）」之建立，進而開展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「關鍵詞」之研究與疏理工作，獨步學林，功莫大焉，他們亦嘗述說「革命」一詞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意義變遷，參見金觀濤：〈革命觀念在中國的起源和演變〉，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》第13期（2005年6月），頁1-51。這等研究取

造更多的無知。

若干「關鍵詞」在近代中國思想世界的成立，當然是走過一段「跨語際實踐」(translingual practice) 漫長歷程的產物。²³ 然而，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」。「跨語際實踐」的「語際」，未必是「中」與「西」／「古」和「今」的二元對立樣態。具有「關鍵詞」地位的那些古老辭彙，作為認識的對象，往往可以穿梭於古今中外之間，凝聚著人們對於過去、現在和未來的想像；各方論者，自由馳騁，依據他們的認識理解，將之建構為簇新的符號架構 (a new symbolic framework)，²⁴

徑，啟渥筆者之思路，受益良多，惟亦略心有不安。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文獻既多且繁，如果某份亦涉及革命理念的史料文獻不在此一「數據庫」之內，則此等宏觀論說，恐即有應需深化（或修正）的空間。例如，筆者研究述說美國《獨立宣言》流傳於晚清中國之整體脈絡，期可反思「革命」如何成為形塑近現代中國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「關鍵詞」，其中涉及孫中山之著述甚眾，而孫之著述，即未列入此一「數據庫」之內，參見潘光哲：〈美國《獨立宣言》在晚清中國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57期（2007年9月），注16，頁4。

²³ 「跨語際實踐」是劉禾的創獲，她認為：「由於中國現代的思想傳統肇始於翻譯、改寫、挪用以及其他與西方相關的跨語際實踐，所以，不可避免的是，這種研究會以翻譯作為其出發點」，在她看來：「研究跨語際的實踐見識就是考察新的詞語、意義、話語以及表述的模式，由於或儘管主方語言 (the host language) 與客方語言 (the guest language) 的接觸／衝突而在主方語言中興起、流通並獲得合法性的過程。因此，當概念從客方語言走向主方語言時，意義與其說發生了『改變』(transformed)，不如說是在主方語言的本土環境裡被發明創造出來的」，參見 Lydia H. Liu, *Translingual Practice: Literature, National Culture,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—China, 1900-1937* (Stanford, C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5), 25-26；參見劉禾著，宋偉杰等譯：《跨語際實踐——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2年），頁35-37。

²⁴ 即如人類學家紀爾茲 (Clifford Geertz, 1926-2006) 對亞、非各新興國家局勢的開展總體分析，嘗指陳曰：人們面對著既有的權威、責任與公民目標 (civic purpose) 都無能為力的普遍迷失感 (a pervasive sense of disorientation)，尋求一個簇新的符號架構 (a new symbolic framework)——不論是以國族主義、馬克思主義、自由主義、民粹主義、種族主義、凱撒主義 (Caesarism)、折衷主義 (ecclesiasticism) 或是各式各樣被重行建構的傳統主義 (reconstructed traditionalism)，亦或最常見的乃是以以上幾種主義的不同組合的形式——從而可以對各種政治問題開展分析、思考與作出反應，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參見 Clifford Geertz, "Ideology

非「中」非「西」，不「古」不「今」，竟可生產出或者是和現實一致或者是逼近歷史樣態的意義，確實可為自身在具體的環境裡倡論立說，或是開展行動找尋正當性。研究這等意義脈絡的「關鍵詞」，如何被建構為簇新的符號架構而「古為今用」的歷史過程，對於我們思索像是「黨」、「革命」之類的辭彙，如何成為好似不證自明的絕對真理用語，²⁵ 自有助益。其間相涉之課題，亟待博雅之士各出慧見，匯涓聚流，以知其廣，稍識其涯。

三、

認識歷史的致知活動，本來就和反省自身現實處境的無窮追索，密不可分。恰若當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的「劍橋學派」（the Cambridge School）或所謂「新政治思想史學派」的名家之一：昆廷·斯金納（Quentin Skinner）²⁶ 之提醒，透過觀念史研究，當可了解，關於我們生活世界裡的那些制度安排，好似永恆真理（“timeless” truths），根本不過只是我們的「在地的」歷史與社會結構的偶然產物（contingencies of our local history and social structure），其實，根本不

as a Cultural System,” *idem.*, *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* (New York: Basic Books, Inc., Publishers, 1973), 220-221。

²⁵ 即如日本學者小堀桂一郎的提示，日本以漢字「自由」翻譯“liberty”或“freedom”，固是十九世紀「文明開化」時代的事，但是，通過日本古典漢語的研究，其實日本古代早已存在與“liberty”或“freedom”意義可以相通貫串的「自由」概念，因此，這等意義的「自由」，實為日本自身值得珍愛的「精神的財產」，參見小堀桂一郎：《日本人の「自由」の歴史——「大宝律令」から「明六雜誌」まで》（東京：文藝春秋，2010年）；其具體論證，涉及廣泛；其詮釋恰當得失，有待專家公評，自難詳述。

²⁶ 所謂「劍橋學派」或所謂「新政治思想史學派」，當然只是寬泛之說，其主要構成分子斯金納、波考克（J. G. A. Pocock）與鄧約翰（John Dunn），他們的探討主題與研究取向，仍各有差別，綜述之作，見 Richard Tuck, “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,” Peter Burke, edited, *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* (University Park, PA: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, 1992), 218-231。

存在這等好像永恆真理的概念，相對的，僅只存在著與各種不同社會相應而生的各等概念。²⁷ 那麼，透過「新名詞」抑或「關鍵詞」的研究，識其淵源，曉其本末，無疑也可提醒我們，曾經一度眾知廣曉的「新名詞」與「關鍵詞」，本是漫長的歷史過程與現實需求相互糾纏的產物；一旦將這些「新名詞」與「關鍵詞」進行「歷史化」的工作，當可顯示它們在歷史／生活世界裡的意義和地位，其實未必「理所當然」，更絕對不是「天經地義」；對挑戰現實的意識形態霸權，自必啟發無限。

然而，探討「新名詞」抑或「關鍵詞」的事業，畢竟還是歷史學的工作。既然是史學研究，就必須立基在紮實的材料基礎上；沒有紮實的材料基礎，卻專以形構理論、概念等空言為能事，不過是對史學自身學科紀律的侮辱。即如胡適（1891-1962）推崇晚清一代名家阮元（1764-1849）提出「剝皮主義」的貢獻，認為他的名著〈性命古訓〉「用舉例的方法，搜羅論性的話，略依時代的先後，排列比較，使我們容易看出字義的變遷沿革」，「這種方法用到哲學史上，可以做到一種『剝皮』功夫」。所以，胡適希望後起者「對於一切哲學觀念，也應該常常試用這種剝皮手段」，從而領悟明白「哲學觀念是常常隨著時代變遷的」。²⁸ 本期《東亞觀念史集刊》刊布「從『新名詞』到『關鍵詞』專題」之諸篇論文，涉及廣泛，未必皆奉阮元為宗，亦非共同師法胡適，基本都可以依據大量的實證材料，期可將「新名詞」抑或「關鍵詞」的歷史詮釋，盡可能廣輯文獻，期可還諸歷史本身。各篇論著的述說，未必堪稱不易定論，也未必是足式百代的典範，卻都是史家技藝的具體展現，多少提供有助於吾人反思認知的一方基礎。畢竟，掌握思想觀念變化的具體歷史脈絡／場景，才是

²⁷ Quentin Skinner, "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," idem., *Regarding Method, Visions of Politics*, Vol. 1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2), 88-89.

²⁸ 胡適：《戴東原的哲學》，收於詹宏志主編：《胡適作品集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公司，1986年），第32冊，頁107-116。

可能邁向宏觀歷史書寫的通衢大道；如是以爲，對我們開展歷史知識的生產活動的反思，掌握自身現實處境的歷史性（historicity），²⁹ 庶幾稍有助益。

本期專題論文，以「從新名詞到關鍵詞」爲號召，然業績所得，本非全璧，不免辜負有心之士的期待。只是，這等學術事業，自非一朝一夕之功；可待開拓的思想視野，本是開闊多元；諸篇論文之得失所在，自待學林同好公評眾議。筆者承擔總匯諸篇佳作之責，爰以「野人獻曝」之心，略抒所見，希望可以得到關心相關課題的先進讀者的指教與呼應。路長遠兮，有待史界同仁上下求索的天地，實在無限廣袤。如果本期專題論文的問世，能夠爲推動相關課題與「觀念史」之研究，稍有啟沃，進而積蓄有助於未來研究的動力，必將是筆者與編者的最大榮幸。

（責任編輯：莊勝涵）

²⁹ 即如德立克（Arif Dirlik）之申論：在跳脫「歐洲中心說」之後，應倡言歷史的認識論（historical epistemology），至少澄清了現在如何利用與誤用過去的方式（the ways in which the present uses and abuses the past），也可以提醒我們思考自身的歷史性（historicity）——我們現在的所言所爲，爲什麼和過去的人們所言所爲有那些的差異，參見 Arif Dirlik, “Is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? Globalism, Post Colonialism, and the Disavowal of History,” *idem., Postmodernity's Histories* (Lanham: Rowman & Littlefield Publishers, 2000), 63-89。